

*Research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eligious Texts*

宗教经典汉译研究

主 编

雷雨田 万兆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宗教经典汉译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eligious Texts*

主 编

雷雨田 万兆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经典汉译研究/雷雨田, 万兆元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097-4722-3

I. ①宗… II. ①雷… ②万… III. ①宗教经典-汉语-翻译-研究 IV. ①B92 ②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8407 号

宗教经典汉译研究

主 编 / 雷雨田 万兆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范 迎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王玉霞

责任校对 / 王洪强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722-3

定 价 / 69.00 元

印 张 / 18.75

字 数 / 297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关于目前我国宗教经典翻译研究的几点思考

许 钧*

最近一个时期，我特别关心经典的翻译问题。我知道，近年来国内有关翻译研究的研讨会不少，但是以宗教经典翻译为专题、邀集不同学界的学者探讨多种宗教经典的翻译的研讨会并不多见。所以，当得知“宗教经典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穗成功举办的消息，我特别关注。据介绍，从会议的筹备过程、论文的质量以及现场研讨的情况来看，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后，中国译协网、中国宗教学术网、《澳门日报》等多家媒介报道了此次会议，《世界宗教研究》和《东方翻译》等学术刊物也发表了会议综述。

翻译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活动之一，对文明的交流与演进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中国规模宏大的佛经翻译，还是西方波澜壮阔的《圣经》翻译，都是明证。直至近代以前，宗教翻译一直是翻译活动的重中之重；即便在非宗教翻译跃升翻译主流的当代，宗教翻译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中国而言，除了佛经翻译，《圣经》翻译、《古兰经》翻译以及新兴

* 许钧，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担任 META、BABEL、《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翻译》等国内外 10 余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或通信编委，已发表法语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 200 余篇、专著 7 部、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 30 余部，1999 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2008 年与 2010 年两度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

宗教经典的翻译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翻译经验和理论论述，值得深入研究。近日读了“宗教经典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宗教经典汉译研究》，我想结合该文集，谈谈我对中国当代宗教经典翻译研究的几点思考。

第一，关于进一步挖掘整理传统宗教经典译论的必要性。客观地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佛经译论来说，《翻译论集》（罗新璋编，商务印书馆，1984）、《中国译学理论史稿》（陈福康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朱志瑜、朱晓农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中国翻译通史》（马祖毅，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等书已经做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工作。就《圣经》译论而言，也有《圣经汉译论文集》（贾保罗编，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译经论丛》（刘翼凌编，香港福音文宣社，1979）、《上帝的爱——缀网集》（小民编，台湾圣经公会，1981）等集子问世。当然，佛经译论与《圣经》译论尚有进一步挖掘整理的余地，本文集的两篇文章给了我们这方面的启发。藏族学者何子君（奥金奔）在文中指出，与汉译佛经一样，藏译佛经同样产生了切实可行的佛经翻译理论，见于赤德松赞时期的《语合二章》、萨迦班智达的十四条原则、章嘉国师的十六条原则等文献，有待进一步整理研究。译作的序言跋语是译者翻译思想的载体，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门洸的文章通过对八篇历时《圣经》汉译本序言的分析，探讨了中西方译者在翻译意图、主体意识等方面的渐变过程，研究视角颇为新颖。此外，《古兰经》的汉译历史不算短，汉译本也不少，但是尚未见到整理研究《古兰经》译论的著作，将来是否可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可通过文本对比深入研究宗教经典翻译。与数量浩繁的汉译经文相比，中国译经人留下的译论还是比较少的。不过，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或者对比不同译本，也可以梳理译者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的翻译思想。例如，鸠摩罗什是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之一，他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译论著述，但是学者们借助梵语原文以及玄奘等其他译者的译本，得以一窥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杜寒风根据有关文献和研究，总结并评述了罗什的主要翻译方法：删繁就简、添词扩意、改动调整、对比校正等。这

些方法与当代翻译理论提出的译法多有暗合之处，对当今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研究大有借鉴意义。当然，要更好地进行文本分析，需要研究者精通原文。在文集中，精通希腊文的刘美纯介绍了不久前问世的《和合本修订版圣经》的修订原则及相关应用，精通阿拉伯语的沙宗平对《古兰经》中乌玛（أمة）一词的不同译法加以研究，而精通希伯来文的姜宗强则对《圣经》中译遇到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这些论文都使用了文本对比分析的方法，加强了研究的深度。

第三，借助当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宗教经典翻译。以当代理论研究宗教文本的翻译，当能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新的见解，任东升和 Amrollah Hemmat 的文章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宗教经典的翻译一般都会经历从个人翻译到机构型翻译的转变过程，而佛经汉译和圣经汉译在组织体制上分别采取了“译场”和“译委会”的形式（《古兰经》的汉译却没有出现机构性的翻译方式，其原因值得深入探讨）。任东升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了这两种机构性翻译的三个相同点和三个不同点，并借助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视点，指出两种译经体制差异的根源，初步构建了机构性翻译的社会学模型。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的 Amrollah Hemmat 博士利用巴赫金（Bakhtin）的文学理论、古夫曼（Goffman）的“框架分析”理论、贝特森（Bateson）的“双重束缚”理论、贝克尔（Becker）的“动态语言”理论、伽达默尔（Gadamer）的阐释学理论来研究宗教文本的对话属性和翻译的主观性，得出了令人信服结论：翻译是一种视野的融合，是文本和译者之间的一种动态对话；译者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纠正，使译文尽可能接近作者的原意，尽量把翻译的主观性降至最低。

第四，关注新兴宗教经典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在这次研讨会上，新兴宗教巴哈伊信仰的经典翻译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和重视。一个半世纪以来，巴哈伊经典已被译为 800 余种语言；其汉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且汉译活动仍在大规模地进行，形成了我国当代宗教文献翻译的新景观，值得深入探讨。不仅如此，与以往的宗教文献不同，巴哈伊权威文献中含有大量关于翻译的论述，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也不乏具体的指示，值得译界挖掘梳理。然而，翻译界对巴哈伊经典的翻译鲜有研究，国外只有零星的

探讨,国内译界似乎从未听闻这一领域。在此背景下,万兆元抛砖引玉,简要回顾了巴哈伊经典的翻译历史特别是其英译史和汉译史,接着梳理了巴哈伊权威文献中有关翻译标准和翻译程序的论述:巴哈伊的翻译标准一言以蔽之,可概括为“符合原作”或“与原文一致”,细究则可分为“忠实”“通顺”和“优美”三个标准;至于翻译程序,巴哈伊信仰认为理想的做法是由称职的委员会而非个人来翻译所有圣作,并对译者素质、翻译步骤提出了具体指示。论文集所附的“巴哈伊权威文献论翻译”中英文汇编,分别按照语言和言语、原则与标准、策略与方法、风格与文风、复译与可译性、翻译委员会、译者素养等主题作了分类整理,很有研究参考价值。这是国内学界首次正式探讨巴哈伊经典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第五,加强与国际翻译界的交流与对话。当今时代是一个彼此交流、互通有无的时代,翻译研究亦应如此。然而,中国翻译界与国际翻译界的交流长期处于极不对等的地位:西方翻译理论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国际翻译界却很少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好在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观。20世纪末,为了促进中西译界的交流,我们曾约请中国翻译界的数位学者用英文或法文撰写了一批反映中国的翻译活动与理论研究成果的论文,后由国际著名翻译理论研究季刊 *Meta* 以“中国翻译研究专号”的形式推出,在国际译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几年后,张佩瑶主持编译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由英国圣哲罗姆出版社出版。该选集依照选、译、评、注结合的“厚实翻译”原则,将中国的传统翻译话语特别是佛典翻译论述全面而细致地展现在国外同行面前,在中国传统译论及其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征途中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今后,中外译界的这种交流必将进一步巩固并拓展,而其中宗教翻译研究的交流仍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上便是我对中国当代宗教经典翻译研究的几点思考,应《宗教经典汉译研究》两位主编之请形成文字,代为文集之序。

许 钧

2012年12月12日

序 二

吴云贵*

当今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基本关系格局，学界称之为“宗教多元主义”。宗教多元主义的基本含义，可以理解为人类各种宗教产生、发展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下，每一种宗教都有自身的价值和相应的受众，各教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团结合作，为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基于宗教多元主义的共识，“宗教经典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以探讨宗教典籍翻译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主，但与会者很少从宗教典籍通论的角度谈论翻译理论方法或技巧问题，而侧重于从自己所熟悉的某一专业领域进行论述和交流。这一基本趋势反映在目录上，就是根据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以及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各自的实际情况，分别就各教经典汉译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展开广泛、系统、深入的讨论。这一框架设计的合理性在于，按照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人们只能通过个别事物认识总体，只能通过宗教典籍翻译的个别案例来揭示宗教典籍翻译的目的性、理论指导和重要意义以及这件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谈到翻译工作的质量要求问题，许多人立刻就会联想到信、达、雅并且认同这一难以企及的高标准。其实，对于许多具有宗教信仰背景的译者

* 吴云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研究领域为伊斯兰教理论、现状和历史研究，尤为重视当代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学研究。

而言，翻译工作至关重要的因素也许不是具体的翻译理论或方式方法，而是工作态度问题。在许多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们看来，宗教教义或信仰体系中所蕴含、所揭示的真理和价值，是超验的、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和“永恒的普世价值”，只有虔诚的笃信上帝神明的人才能胜任宗教典籍的翻译，才能用另一种语言准确地表达上帝的“神语人言”。不言而喻，宗教信仰的神圣性已使“忠实原文”这一翻译工作普遍性的要求转化为由宗教虔诚所决定的一个人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取向了。如果说各种不同宗教在译经工作上也有某些共识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那么，最显著之点或许就是对宗教典籍目的性和重要性的理解和要求。许多与会者在发言中都谈到，无论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还是已经加入“洋教”的中国人，他们之所以高度重视翻译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把外源宗教典籍的汉译视为向中国人布道传教的工具、手段，“传真经”当然要“慎之又慎”。因此，严格说来，无论是从异国他乡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晚近开始落户中国的巴哈伊教，实际上都是通过译介宗教典籍而为异域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界所了解和所接受的。

宗教典籍的汉译，固然有许多翻译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值得认真总结，这可以说是一个与时俱进、常讲常新的话题。但依我个人看来，翻译工作的社会责任和文化学意义或许更值得我们重视。诚如有的与会学者所言，宗教典籍的翻译，不仅意味着将一种语言文字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文字，而且意味着将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语境和氛围之中，由此而引起的话语权争论和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是具有厚重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文化，要想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只能放下身段，积极主动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翻译者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在于在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架桥沟通，不仅要准确地传达外来宗教思想文化的信息，而且要以中国人所熟悉的语言文字出神入化地表达输入的外来宗教典籍的原意。因此，无论是译经还是布道传教，似乎都没有理由一定要去反对中国化或本土化。但这里说的“化”不是离经叛道的“异化”，而是将外来的思想文化转化为中国语境下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的内容。历史事实表明，从域外传入中国的几大宗教，凡中国化较为彻底的，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也越大；反之，在本土

化问题上思想保守的，也就很难能进入中国主流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某些传教士是将“布道传教”解释为“进入文化”（inculturation），这是颇有见地的。

本次研讨会吸引了不少翻译界人士与会，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近代兴起于西方的宗教学，亦称比较宗教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包括东方宗教圣典翻译在内的语言学派曾经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由衷地希望我国从事语言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为我国宗教学学科建设和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作出自己不可替代的贡献。

吴云贵

2012年12月于北京

开幕词 信仰与经典翻译

刘晓明*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尊敬的雷雨田教授：

首先我代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祝贺我们这一次的研讨会顺利的召开！感谢我们诸位专家，我知道有人是从非常远的地方来的，包括国外，还有我们中国港澳地区，以及国内兰州、北京等地远道而来的各位学者和朋友。过去我们讲不远万里，而大家不远千里来到广州。感谢诸位的光临。

我本人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对于宗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对于从事这项工作的朋友，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一点，从我自己所接触到的、非常有限的文献，或者我们所具有的知识，让我产生了这种由衷的感受。我记得丹麦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做克尔凯郭尔，曾经在他写的《恐惧与颤栗》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当然他写过《非此即彼》《论怀疑者》等一系列的书。在《恐惧与颤栗》中，他说我们人类的生活处于三种不断过渡的形态之中。其中，第一种形态是审美；第二种，他认为就到了伦理或道德的阶段；到第三个阶段，他认为是一种信仰的阶段。我们诸位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他怎么会认为后面这个阶段是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对此，我本人觉得不是很好理解。我认真拜读了他的书，后来才理解了他的意思。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

* 刘晓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广东省重点研究基地“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广州市中国语言文学一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广州市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认为的审美的阶段，实际上就是我们处在一种人的感性的阶段。我们凭自己的感觉、感受，包括我们的感觉器官，来感受这个社会，然后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进行生活的选择。到了这个观念出来以后，克尔凯郭尔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处在一种人的本然的状态。接着，他认为要进入一个更重要的理性的阶段，这个就是他所说的伦理的阶段。伦理的阶段，我觉得按照他的讲法，我们传统的社会大多属于这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他觉得还不够，还要进入信仰的阶段。

当时，我对于这些不是很理解。那么，看了康德的著作，我就感觉到他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康德的三大批判，特别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之后进入了实践理性批判，其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要有内心的道德法则。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曾经引用了他的一句话。这句话出现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实际上在他的结论的最后一页。他这么说：有两样东西一直让我们感到敬畏，每当我们想起它们就会感到深深的敬畏，心情就会非常激动。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那么，为什么内心的道德法则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他会觉得它是超越理性的东西？我觉得康德的意思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作为人，有一种超越理性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并不局限于我们平常的、在理性范畴里所作出的判断。他举个例子，叫做绝对命令。他认为我们判断事物的好坏的时候，有一个绝对命令在我们的内心。他说的绝对命令是什么呢？每当要判断一个事物，我们是不是要让大家遵守，首先就是自己能不能遵守。如果一个律令你自己都不能遵守的话，就没有权利让别人都遵守它。这实际上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西方他们会成立陪审团，在法院判决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就是那种根本没有受过法律教育的随机抽取的普通市民做最后的判决。那么，他们依据的是什么呢？他们依据的并不是我们日常的法律条文，他们对此可能一无所知。但他们往往是一个案件最后的仲裁者。依据的是什么？依据的就是他们内心的道德法则。那么作为人，我们都有这种判断力，最起码的判断力。所以，由此，由康德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有助于我们上升到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这种信仰。信仰就不仅仅是来自于道德的、伦理的，或者来自于我们所讲的法律等的限制，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我们作为人

的一种本然。

过去我们讲到信仰的时候，好像是说放弃理性，好像是进入了非理性。我觉得不是如此。他讲的非理性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审美的阶段，完全凭自己的感官，凭自己的感觉判断事物。他认为审美的阶段是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那是非理性的。但是到了这个里面，他认为这个才是最终制约理性的，或者说带有原理性的因素。我觉得康德是从这个意义上阐释这个观点的。从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理解信仰。信仰有很多种表现形态，宗教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人类进入宗教，实际上是进入一种信仰的阶段。当然，我指的是比较正面的意思。因为过去，我们也会讲到有些比较极端的信仰。我指的是不是那种信仰，我指的是比较正常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信仰。那么，这种信仰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让我感觉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所研究的经典，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超越时代的趣味和起伏变化，而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经典，是千百年来大家共同的、经过人类文明的淘洗而保存到今天的，我觉得可以说是值得人类继承发扬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我们本身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处在对于各种经典的探讨和了解之中。实际上，我觉得尽管我们不一定做的是经典研究，但也是与经典相关的，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经典带给我们的永恒魅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康德的一些著作。经过这么多年，我们读多少次，都会感到受益匪浅。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各位同人，来今天的大会，共同商量、探讨我们的经典翻译理论，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项工作。而且，我个人认为这种翻译工作不仅局限于经典。我自己是做古代文学的研究，实际上，古代文学，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翻译。因为，我们一定要用今天的思想，站在今天的语境去看待过去的东西。哪怕你读《老子》《庄子》《孟子》，实际上你跟当年的老子、庄子、孟子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在不断的翻译过程中，用我们今天的理念去翻译它。翻译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海德格尔曾经在他的《存在与时间》中说到翻译，他说过一句话——“被翻译过了”。意思是，被翻译过的好像用另外一个东西对它重新进行了解释。但是，

我觉得翻译完全可以从非常正面的意义进行探讨。我深深地感觉到，包括海德格尔或者胡塞尔，或者伽达默尔说得更明确——他讲到先结构，他讲到我们本身所具有的东西，然后接触到外面的东西，让我感觉到它所具有的力量。过去我们曾经讲到建造一个通天塔。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各位正在建构一个我们人类共同的巴别塔，在通向我们人类共同的价值中作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专家！

2012 年 5 月 12 日

目 录

序 一	许 钧 / 1
序 二	吴云贵 / 5
开幕词 信仰与经典翻译	刘晓明 / 9

一 宗教经典翻译通论

宗教文本的对话属性和翻译的主观性

..... 阿姆鲁拉·海玛特 著 潘紫径 译 / 3

机构性翻译的“场域”视点

——佛经译场与圣经译委会比较

..... 任东升 裴继涛 / 22

世界性宗教典籍翻译话语的建构

——以巴哈伊教典籍翻译为例

..... 庞秀成 / 40

二 佛教经典翻译研究

鸠摩罗什翻译佛经方法述评

杜寒风 / 51

试论汉藏佛经翻译理论的共性特征

何子君 / 62

三 基督教经典翻译研究

- 经典的延续——《和合本修订版圣经》介绍 刘美纯 / 79
- 从翻译史研究方法透视传教士译者研究 穆 雷 欧阳东峰 / 96
- 《圣经》中译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思考 陈声柏 姜宗强 / 105
- 近代新教在华译名之争及其文化意义 伍玉西 / 121
- 从汉译本序言看圣经汉译思想的流变 任东升 门 泯 / 134
- 《路德文集》编辑、翻译感言 雷雨田 / 147

四 伊斯兰教经典翻译研究

- 《古兰经》中“乌玛”一词含义初探 沙宗平 / 155
- 关于苏非经典翻译的几点思考 王俊荣 / 179

五 巴哈伊教经典翻译研究

- 巴哈伊经典翻译：历史、标准与程序 万兆元 / 193
- 经典翻译与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播 许 宏 / 211
- 浅析《隐言经》的两部通行中译本 何琼辉 / 221
- 准确与传神：塔希丽诗歌翻译的诗体选择及思考 潘紫径 / 231
- 后序 经典的翻译，翻译的经典 穆 雷 / 243
- 附录 巴哈伊权威文献论翻译（附英文） / 249

一 宗教经典翻译通论